

中国观

2017年第3期 总第67期

CHINA WATCH

国际视角 前沿观点 World Insight



复旦发展研究院
FUD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Centre for Think-tank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in Shanghai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目录 | CONTENTS

中美关系：试探背后的张力

- 01 中国需妥善应对“公平贸易”成为美国贸易新政的核心点 / 张磊、徐昕
- 03 美国需要对中国施行“接触与遏制”战略 / *Robert D. Blackwill*
- 06 一场幻影：特朗普对中俄的如意算盘打不响 / *Paul Haenle*
- 08 美国需在清明节前确定对华政策 / *Scott Kennedy*

中国问题：国家安全与社会转型

- 11 中国经济不存在崩盘的可能性 只有短期的滞涨威胁 / *Derek Scissors*
- 13 为什么中国不能在 2020 年前实现两岸统一 北京缺乏强有力的军事解决途径 / *Timothy R. Heath*
- 17 伊斯兰国对中国的威胁有多严重？ / *Nodirbek Soliev*
- 20 中国政策目标让步政治转型 / *Michal Meidan*

东北亚安全：聚焦朝鲜问题

- 22 中美通力合作解决朝鲜问题的内在逻辑 / 裴敏欣
- 24 蒂勒森、中国及朝鲜问题 / *Christine Guluzian*

竞争与合作：不只是经济议题

- 26 土耳其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研判 / 张红
- 29 中印竞赛新赛场——佛教 / *Jayadeva Ranade*
- 35 东盟应对中国的言不由衷 / *Tang Siew Mun*
- 37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缘何欧洲国家仍犹豫不决，如何使之发挥作用 / *Andreas Grimmel, Susanne My Giang*

编辑部

Editorial Department

责任编辑	Responsible Editor
张怡	Zhang Yi
沈国麟	Shen Guolin
黄昊	Huang Hao
执行编辑	Executive Editor
王柯力	Wang Keli
栏目编辑	Column Editor
付宇	Fu Yu
周光俊	Zhou Guangjun
刊物设计	Art Editor
范佳秋	Fan Jiaqiu

中国观

CHINA WATCH

主办 | 复旦发展研究院 FDDI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CENTREMS

地址 | 复旦大学智库楼 211 室

中国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Room 211, Think Tank Building,

Fudan University

220, Handan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箱 | thinktank@fudan.edu.cn

电话 | 021-65645596

021-55665501

鸣谢 | 上海钰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需妥善应对“公平贸易”成为美国贸易新政的核心点

张磊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WTO 学院院长

徐昕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WTO 研究教育学院副教授

一、美国新贸易政策凸显对“公平贸易”的追求

按照美国法律的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 2017 年 3 月 1 日代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2017 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在该议程中，川普政府一方面表明其将继续坚持自由贸易，但更多的信号则强调公平贸易将成为美国新贸易政策的核心点。

1、为了实现公平贸易这一目标，特朗普政府首先明确放弃了遵守及执行 WTO 争端解决机制裁决的立场。认为现有的 WTO 争端解决机制违反了其不得增加或减少成员方权利或义务的核心理念，并导致裁决屡有损及美国利益，因此建议美国将维护国家主权置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这一贸易政策之上。

2、明确表态要恢复执行美国国内对歧视性外国贸易措施实施报复的相关法律，以此打击所谓对美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报告认为美国国内贸易法中存有多项法律授权美国可以使用单边贸易行动，之前只是自动让位于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授权。鉴于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不能很好的打击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建议美国回归本国传统的国内贸易救济路径。

3、通过双边路径与全球主要市场国家谈判新的且更优的贸易协定。所谓的更优贸易协定，报告强调核心点在于保障美国享有充分的公平竞争机会，并利用法律手段严格打击贸易对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二、公平贸易剑指中国，我方需高度重视、妥善应对

对于特朗普政府主推公平贸易的这份《2017 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我方的应对建议如下：

在应对战略上高度重视，应认识到美国完整的提出了“公平贸易政策”，绝非只是简单的否定 WTO 争端解决机制，其范围也远大于之前 WTO 对不公平贸易提供救济的概念，预计川普政府之后对此会有更完整的阐述和推进。不过，尽管公平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剑指中国，但我方在应对形式上不应主动对号入座，不在任何场合表态认为其所谓的“公平贸易”政策针对中国。

具体的应对措施而言，短期内我方应集中针对美国背离 WTO 多边贸易体制的做法。我方应单独或联合多个国家共同塑造强烈的国际舆论，强调美国一旦绕开 WTO 争端解决机制，针对不公平贸易单边采取报复性措

施的做法在 WTO 项下的违法性。对此我方可以释放较为强硬的态度，包括一旦如此我方将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下提出申诉，以及很可能直接对美国的进口征收报复性关税，甚至设立各种非关税壁垒来限制美国出口商和投资者的市场准入。

长期来看，应注意到美国将在新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增强保障公平竞争的内容，这将是对其公平贸易这一新政策的完整推动。这部分将涉及到原产地规则、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电子商务数据自由流动、中小企业、环境和劳工保护等条款，预计美国将在这些领域推出更高标准的要求，中国宜从公平贸易的角度加强对上述领域规则条款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提出符合我方利益的观点。

美国需要对中国施行“接触与遏制”战略

Robert D. Blackwill

尽管美国几十年来都对美国采取“接触与防范”的外交政策，但这不应成为当今对华政策的主题。鉴于中国蓄意打破地区平衡稳定的行为，防范策略已经行不通了。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应采取“接触与遏制”的对华政策。

特朗普将于下月在佛罗里达首次与习近平会面，曾经长期为蒙大拿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的奥巴马政府驻华大使的马克斯·鲍卡斯表示，美国亟需扭转当前被中国推着走的形势，并及时制定新的对华战略，其还表达了对于奥巴马政府在中国问题处理上缺乏战略眼光和软弱的不满。鲍卡斯认为，中国以牺牲美国的利益为代价，以达到其经济复苏和提升全球影响力的长期目标。与之相反，美国则常常被中东等事务影响。“华盛顿外交政策倾向于将中国的问题特别处理，搁置再议。”鲍卡斯认为，“我们的不足在于政策过于临时，似乎并没有长期战略。”

中国将试图解决其经济与地缘政治上的紧张关系，但无论结果多么具有建设性，中国也不会选择走“贸易大国”之路。中国将继续崛起成为政治、地缘经济、军事能力全方位发展的传统大国，从曾经美国居统治地位的亚洲扩大影响力，直至在未来影响全世界。

美国试图把中国“融入”自由国际秩序的举措已经使其在亚洲的重要国际利益受到了威胁——并将导致美国在全球的权力地位受到挑战——华盛顿方面需要重新制定对华战略，对中国的崛起采取容忍态度而非原先的支持态度。美国需要对政策进行重大改变以应对中国的“破坏性外交”、地缘经济胁迫以及军事扩张对美国在亚洲以及其他区域的国家利益的损害。

保持美国在全球的权力地位和影响力应当成为美国二十一世纪国家战略的核心目标，而作为新型遏制战略核心的政策的调整应当建立于对这一点的清晰认识之上。在中国崛起的形势下维持国家地位，美国需要大力发展经济，着重培育那些赋予了美国经济优势的颠覆性的创新，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以增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在美国的盟友以及交易伙伴间进行贸易优惠的创新性安排以在中国不参与的情况下增加双方利益；与盟友们再创设一个技术管控机制以防止中国获得能够对美国及其伙伴造成“高杠杆战略危害”的军事和战略能力；协调建构美国及盟友和伙伴在中国周边的权力政治格局；提高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国反对的情况下在亚洲边缘区域推进计划的军事力量——同时以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方式与中国进行多方面的交往。

由于美中两国作为长期战略性对手的可能性很高，新型遏制战略以及美国及盟国伙伴在与中国交往时有必要将能够抑制中国误用其日益增长的能力的因素进行整合。现在以及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均是美国最有竞争力的对手。目前，中国的崛起已经在地缘政治、军事，地缘经济上对美国的权力地位、盟友以及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了诸多挑战。未来中国虽不均衡但将持续的崛起将损害美国重要的国家利益。政府当局与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接触难以称为大的战略，更算不上有效战略，其只是以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 and 长期战略利益为代价，在当前国际体系中衡量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整体实力。可以说，美国早就应该提出更为清晰一贯的策略以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

考虑到中美两国不可能真正确立基本互信，无论是和平共处、互相理解的战略伙伴关系，还是新型大国战略伙伴关系，都很难实现，因此，确立对华长远战略更显得迫在眉睫。由于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双边关系最有可能的走向是谨慎试探、彼此约束可能采取的行动，但未来一段时期内达成这一目标并不容易。在当前危险形势下，美国外交的目标主要是管理并缓和两国之间由来已久的紧张形势，寄希望于消除美中间的紧张态势基本不太可能。

有鉴于此，美中对话应当更加坦诚，以更私人化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两派官员在华盛顿或北京的谈判桌前布道。官员们希望今天能重复昨天的事情，明天能重复今天的事情。因此，华盛顿和北京方面的代表总是不断模式化的进行着对对方的控诉。而所有人都对这些不断重复的论点十分熟悉。正像中国的谚语所说：“多言不达，正如缘木求鱼”。

为了使美中之间高水平的双边对话能够有所成效，应当避免将论题聚焦于声讨对方的背信弃义。比如，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谴责——不论通过公开途径还是私人途径——并不会影响中国政府包括香港地区的政策决策；而无论中国如何抱怨，美国也不会削弱对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盟友系统。美中双方也不太可能承认对方的大战略。不论怎样，地区问题都会对中美关系造成损害。

中国崛起对美国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还会持续。而中国的对美战略——至少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不可能允许美国在亚洲和平和安全问题上扮演关键角色。因此，关切到亚洲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美国是否有这一政治意愿；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军事和外交能力；与盟友的紧密连接；更为重要的是，处理好对美国影响深远的对美战略。

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处理适得其反。且不说，特朗普之前对美国在亚欧的盟友的忽视，其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电话以及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挑衅，其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决策便对美国在亚洲的力量造成了严重冲击，并为中国在这一区域占据霸权地位提供了机会。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彭斯、马蒂斯、蒂勒森、凯利、蓬佩奥和麦克

马斯特以及其他更为现实的保守派名人，能够在四月会见习近平之前说服特朗普接受对中的遏制战略。但这一点没人可以保证。就像精灵 Puck 在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中所说，“上帝呀，这些凡人怎么都是十足的傻瓜！”

nationalinterest.org

译者 / 高晓宇

一场幻影：特朗普对中俄的如意算盘打不响

Paul Haenle

在大国外交领域，比理查德·尼克松 1972 年访华更具影响的事件十分少见。其时，中美双方在面临共同敌人苏联的情况下选择和解。四十余年后，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向其昔日的对手——尤其是俄罗斯表达了与之前类似的意愿，重启双边关系。特朗普相信通过其高超的协商艺术，可以有效达成地缘政治新政，但实际上，更为持续性的政策架构才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最为有利。

2017 年 2 月，卡内基 - 清华研究中心召集了来自中美俄的顶尖学者召开了其第四届全球对话年会，会议围绕特朗普任职以来的两大外交赌局即其亲俄远中的外交政策展开讨论。这些具有丰富的政策制定经验的与会者们认为，特朗普所期望的从三角外交中撷取利益的打算不过是一场幻景，这一打算不但忽略了中美俄关系的历史复杂性，而且没有考虑到这一政策导向会带来的巨大对价。与其对美中或美俄关系抱持不切实际的期望，美国当局更应着眼于谨慎处理不可避免的分歧，逐步推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并坚定捍卫美国的国家价值观念。

特朗普在其竞选期间，多次重申其希望缓和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关系。其与俄罗斯进行外交合作的主要设想在于俄可以作为美国对抗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力量重要伙伴。然而，包括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前美国驻俄大使威廉·伯恩斯在内的许多专家都提出，这些“看起来很美”的提议表明俄罗斯方面对叙利亚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支持巴沙尔·阿萨德的野蛮政权——实际上，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只会使极端主义团体的威胁性进一步增强。

除了双方的目标不一致之外，美俄合作还有诸多障碍。由于两国政府之间缺少信任并且对恐怖主义的根源以及如何应对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美俄两国在反恐方面的合作并不愉快。为了促进双方的军事合作，两国需要共享信息，但美国军方与情报部门都反对这一提议。

而且，俄罗斯方面试图强迫美国用俄罗斯的方式处理美俄关系，因此美国在推进美俄关系时应保持一定的警惕。普京希望如此能够避免西方世界对乌克兰冲突的不满波及到美俄关系的其他方面。特朗普方面应在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基础上推进美俄关系，而不是一味安抚俄罗斯。

在对中国的态度上，特朗普接听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电话的举动引起了波澜，其之后又质疑中国与美国在贸易和其他事项上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美国接受一个中国政策约束的合理性。这一举动反映了特朗普拟以台湾人民的命运为议价筹码，希望在朝鲜核问题和中美经济关系中谋得更

多利益。

虽然特朗普在美中关系中寻求最大利益是正确的，但针对一个中国政策发力却是错误的做法。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与台湾关系法》所共同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允许美国在与台湾保持文化、商业以及其他非官方联系的情况下，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79 年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政策还使得美国得以维持与台湾的合作以及对台的军火贸易，并对台湾海峡几十年来的和平稳定有重要作用。另外，这一政策使得美国在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利益进一步增长：也使台湾转型成为充满活力的民主政治体并成为美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

这一形势使特朗普迅速明白，在美中交往中，一个中国政策不是谈判的筹码——而是谈判的基础。不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中美关系会立刻停滞，台湾也将在受限的国际环境中艰难前行。正像特朗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电话中隐晦表明的一般，承认一个中国政策与保护美国利益相一致，为了谋取中国在朝鲜问题、贸易或其他事项上的让步，而以一个中国政策作为交换筹码对于谋求和平的执政者来说并不划算。

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甚至包含诸多冲突。尽管在某些方面达成了共识，但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依旧存在。而且这一现实无法根本性扭转。

特朗普组建了一个包括麦克马斯特中将和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内的，由美国经验最为丰富和知名的战略咨询家、军事顾问和政策制定者们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该机构有望超越当前政治框架，更好的处理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并为美国长期的国家安全利益服务。如果美国政府能够缩小分歧，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在多个方面促成国际合作，将在推进其外交政策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carnegietsinghua.org

译者 / 高晓宇

美国需在清明节前确定对华政策

Scott Kennedy

如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于4月6日至7日在海湖庄园访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报道属实，美国大体上需要在三个星期内决定对中国的政策。同时，这一时间恰好是中国的清明节——4月4日，这是中国人祭拜祖先，庆祝春天到来并为健康祈福的节日。特朗普总统必须做出的决定是，是遵循理查德·尼克松之后的历任总统们的脚步积极寻求美中合作，还是对中国采取更为明确的对抗方式。

特朗普所提供的方案是，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并且挑衅其“一个中国”政策，同时批评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做法和对朝鲜的态度。但这些想法并不能称之为政策，也不能成为两国领导人为时两天的会晤的讨论基础，更不能为中美关系定下基调。而不做进一步思考，只是简单地寄希望于随机应变必然会使美国陷于被动。

确定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容易，部分原因在于当局主要由骨干人员控制。团队中有内阁秘书和常任公务员，但副手却很少。选举过程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副手会被提名，因此想要整合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整体性咨询机构几乎不可能。

政策难以确定的时间越长，中美关系的利益相关方愈加焦虑。根据中国的官方数据，一场贸易战使得美国的关税上涨了45%，这至少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一个点（非官方的估计是两个点），尤其是在这个经济形势不佳，中国又逐渐占据领导地位的时期。与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迫切希望能够打开中国市场，但他们在采访中承认，由于可能引致中国的报复，特朗普式的救援政策会使他们的处境更加糟糕。同时，政府内部也有分歧，特别是在贸易政策方面，在美中外交政策上究竟是选择施加压力还是保持耐心，双方争持不下。混乱的形势已不仅是一个策略，而的确对政府制定和实施相对稳定的对中政策形成了阻碍。

这次与习的会面恰好提供了一个平息争议，为中美关系提出清晰愿景的契机。为了减少不确定性，特朗普需要回答五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中美关系如何增进美国国家安全与社会繁荣的总体利益？1984年4月，当时的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时曾说：“一个爱好和平的中国，显然对国际稳定和美国最为有利。”而自1979年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后，几任美国总统也都提供了类似的方案。从2014年11月起，巴拉克·奥巴马也选择了与前述总统们类似的政策：“美国欢迎热爱和平、稳定、繁荣的中国不断崛起，在世界上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角色。”特朗普是否准备说出类似的话呢？倘若如此，便表明着美国的商业和国家

安全利益需要崛起的中国的帮助，只是中国需要在国际体系中运行。如果是这样，美国的政策便不是要限制中国的崛起，而是要控制其崛起的路径。不把上述考虑与中国塑造“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然要求混淆在一起非常重要，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接受新型关系，而是要求美国不要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最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控制性权力和中国的领土完整），给中国在亚洲更广泛的发展空间，并准备与中国协商处理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但是这种给予中国同等权利的角色定位，对于美国来说并不实际。前副总统拜登访问中国时曾一度失言，政府花费了大量精力消弭其影响。不论特朗普政府拟以美国利益为基础的前提下制定何种对中政策，都必须避免类似的不当言论。

第二，特朗普政府希望从中国得到什么？每个人都明白其抱怨的内容，但根据我对过去几个月里遇到的中国官员们的观察，几乎没有人清楚美国究竟想得到什么。

在经济方面，特朗普抱怨进口和投资方面存在壁垒，但他也许对美中双方贸易下降带来的进口大幅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双边贸易逆差减小而感到满意。其抱怨中国操纵汇率，但如果自由浮动的人民币会导致贬值和中国出口增加的话，其态度便又不明朗。特朗普怒斥中国的工业政策，但他需要阐明他认为哪些民族保护政策最为恶劣。此外，其还需要解释，是否应该通过对中政策或商业成果的变化来衡量美国问题的解决是否令人满意。

其在安全方面对亚太地区的“要求”似乎较为清晰：对朝鲜施压，并接受美韩针对平壤方面日益增长的能力所采取的联合自卫行动；在南海问题上，将岛礁上的军事力量撤回，并以更合作的态度与各方进行协商，接受美国军舰和商船在该区国际海域和空域的航行自由；不对台海局势进行挑衅。但特朗普需要进一步阐明，这些要求如何能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需求。更加模糊的是，其希望中国如何在全球性问题上予以合作，尤其是打击恐怖主义方面。

第三，美国准备作出何种妥协以使中国愿意满足上述要求？特朗普可以肯定习近平会列出自己的“要求”清单。但到目前为止，政府表示希望中国单方面让步，而美国无需在整体框架或是具体政策方面进行调整。特朗普方面需要思考如何应对中国可能提出的各类要求，其中包括双边投资条约、市场经济地位、减少对先进技术出口的管制、同意与朝鲜的对话以及减少在中国附近的地区的军事活动等。

第四，特朗普政府需要为中国可能不会满足的要求做哪些准备？中国可能不会很快解决核心问题。而是先采取一些较为表面的措施——如推高人民币的币值，签署一些大型进口货物（例如页岩气）的合同，并与东南亚国家签署一些行为准则——但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中国的经济治理模式以及安全形势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变化可能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

美国政府需要确定自己愿意等待多久，一旦耐心不足，可以采取什么措施，例如全面提高关税，自主决定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的贸易救济，暂停或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扩大对中国附近区域的盟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支持等。美国还需要根据中国违反其承诺的情况来考虑采取这些措施的正当性——通过 WTO，海牙法庭对南海问题的仲裁决定等——在中国从未作出明确的承诺的方面则可以将理由归于中国违反了互惠原则或公平原则。最难的是确定美国为了长期利益愿意在多大程度上牺牲短期利益，考虑到中国不可能轻易投降，而会以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方式报复。如果美国希望强硬，就需要清楚表明其坚持下去的决心。

最后是第五点，如何具体安排对中政策？特朗普政府需要确定是继续在官方层面进行协商，还是强调领导人个体化层面的沟通。一方面，战略与经济对话（S & ED）和商务与贸易联合委员会（JCCT）为减少官僚作风的行为方式提供了渠道。但另一方面，它们的机构变得如此庞大以至于需要建立常规渠道处理其日常问题。如果美国要减少 S & ED 和 JCCT 处理问题的广度或深度，那么白宫方面就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实际管理中美关系，包括为两国领导人安排更加频繁的定期会议等。

特朗普政府还需要建立内部决策机制。目前似乎有多股力量希望能够成为特朗普的军师，这种情况很难处理好复杂而密切的美中关系。政府可以允许这些决策群体分管经济和安全问题的不同方面，也可以使用更为传统的等级式的整体决策过程。最后一种结构显然比前两种选择更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不论怎样，程序上的清晰性都会对美国有所裨益。

与其打高尔夫，特朗普与习近平不如尝试清明节的传统活动：放风筝。某种程度上，中美关系正像被民族竞争主义的旋风卷起的风筝。无论是在海湖庄园外的空地还是在谈判室里，特习两人都需要发挥聪明才智以保证中美两国关系的风筝不被暴风雨击落，稳定的飘扬在空中。

www.csis.org

译者 / 高晓宇

中国经济不存在崩盘的可能性 只有短期的滞涨威胁

Derek Scissors

过去 18 个月以来，关于中国经济面临崩盘的言论甚嚣尘上，这些观点有可取之处但是过于偏激。中国目前遇到诸多挑战，这一点已被市场熟知，所存在的问题可能带来滞涨风险，但离崩盘还相去甚远，中国如果发生滞涨会以一种和崩盘截然不同的方式影响美国。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近期发布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报告重燃了市场对于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担忧。报告指出中国最值得关注的便是债务问题，经合组织预计到 2016 年年底，中国的债务规模将达到 GDP 的 250%，这一比例和美国持平，单纯从数字上来看可能并不可怕，但是其发展趋势值得慎重对待。因为中国的债务大部分是公司债，而且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在仅仅过去 10 年间累积起来的，这并非是经合组织杞人忧天，中国的领导层也公开承认了这一问题，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

中国正在债务漩涡中越陷越深，瑞士信贷报告称 2016 年中期美国的家庭财富总额比中国多出 61 万亿美元，但到了 2016 年底，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与财富总额呈正相关）反而比美国多出 9 万亿美元，而 2011 年中美货币供应量的差距是 4 万亿美元，换句话说，中国在 5 年间比美国多发了近 5 万亿美元的货币。中国没有像美国那样采取紧缩型货币政策，可能是目前世界杠杆率最高的国家。

这看起来像是一场正在酝酿中的灾难，而且无可避免。过去几年来由于货币超发引发的问题显而易见 ---- 资产泡沫，过量的资金抹平一个又一个价值洼地，从房地产到股票，从大宗商品到债券市场，无一例外。对于投资者来说，如果收益率无法跑赢货币发行速度，实际则面临亏损。

另外，由于过多的货币存量压低了资产收益率，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开始担心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资金盈余方不愿意将资金介入长期项目，而偏好于短期金融资产的快速增值，同时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环境污染，资源日益枯竭等问题，滞涨阴云便开始笼罩。

2008 年房地产泡沫曾引发了美国的次贷危机，但是中国的情况和美国迥然不同。中国的银行和企业经营受到“有形之手”干预，由货币超发引起的资产泡沫可以在政府的掌控下不发生破裂。例如，中国的企业债组成和其他国家大相径庭，约有 2/3 的企业债归属于国有企业，因此不难想象，当危局降临之时，这些企业的企业属性会让位于政治属性，成为政府的左膀右臂，以帮助政府解决经济困境。其中国有银行对于稳定市场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几乎不存在破产的风险，可以不断地给僵尸企业续贷，这样做代价巨大，会破坏金融市场的平衡性，但很难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

险。

这一切对于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从经济层面来说，由中国经济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险还并不明显，这场危机很可能会倒逼中国做出改革，例如减少对经济发展的各种干预和束缚，这样做对于化解危局大有帮助。没有这些改革，中国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难度将大大提升，世界各国无法再寄希望于中国来带动自身的发展。对于那些实力强劲，在中国有巨大市场的美国企业（比如苹果和波音公司）也是同样的道理，他们奋战在中国一线，利润的高低和中国经济的增速快慢密不可分，一旦中国陷入衰退，这些企业将面临巨大损失。

总的来说，中国的经济问题警示美国应当寻求自身的经济增长点，而不是依靠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推动发展。我们对待劳工和资本的政策，以及鼓励创新的理念，是促使经济不断前行的唯一因素，这一点从未变迁。

www.aei.org

译者 / 徐佳炜

为什么中国不能在 2020 年前实现两岸统一 北京缺乏强有力的军事解决途径

Timothy R. Heath

四年后，中国将迎来“两个一百年”——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以及 20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中的第一个百年纪念日。虽然中国政府公开否认设定了统一台湾的期限，共产党的领导们却无疑更希望在“两个一百年”到来前实现统一，或者至少在这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以此彰显其带领下的国家复兴。

虽然海峡两岸如今对双方的经济依赖性达到历史最高，“和平统一”的前景却持续暗淡。中国正全面陷入地区身份超越国家身份的趋势之中。数字科技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国家政府无力满足人民日益扩张的需求，不断增强的人口流动性都削弱了人们对国家和超国家政府的忠诚，加强了地区性、民族性的身份认同。在中国，如何维持香港、新疆和西藏人民的爱国之心就是政府的一大难题。

在台湾，地区身份不断增强，认同中国的人越来越少，岛内支持两岸统一的力量也持续减弱。曾长期统治台湾的国民党——政策上也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如今风雨飘摇，反而是倾向独立的民进党拥有更多选民，成为“台独”趋势的最显著代表。民意调查同时显示人们对中国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仅有 10% 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统一。而支持比例还会不断下降，因为表态中的代际分化越来越明显，在 20 至 29 岁的台湾年轻人中，80% 反对统一。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新华社热烈宣传台湾领导人蔡英文政策失败，支持率下滑。但是这对中国政府而言并无丝毫宽慰。无论蔡英文或台湾前任领导人马英九的支持率有多低，都不会促使民众接受两岸统一。

不管怎么威逼利诱，中国对台湾的努力都未见成效。中国官员一直致力于扩展两岸贸易投资机会，鼓励文化交流，重温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政治协议，然而一切都是徒劳。近年来，感到挫败的中国政府转而付诸强迫性手段。中国媒体散播着退伍将军们攻打台湾的威胁言论，并且加紧宣扬旨在震慑台湾的高调军事演习。2017 年 1 月，中国解放军驾驶航母穿过台湾海峡，此举被广泛认为是蔡英文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通话之后对台湾当局的警告。然而，台湾民众对两岸统一的支持率仍持续下滑。

习近平已经明显失去了耐心，不再利用情感错觉来诱使台湾支持统一。中国的前任领导人们在与国民党官员探讨“九二共识”时，模糊化了“一个中国”的含义。而习近平则明确表示“一中”共识相当于香港问题中的“一国两制”。中国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解释说，习近平已经决定“一国两制”将是台湾回归后地区制度的基础解决方案。中国的官员们甚

至不再掩饰他们想要清除岛内民主情结、令其乖乖统一的意图。张志军表示中国政府寻求的是两岸人民间的“心灵一致”，以此“加强团结”、“实现凝聚力和长期稳定”。这种委婉说法让人不寒而栗。他解释说实现这个目标要求“统一后适当处理海峡两岸在体制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他的话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常用说辞，用来消灭反对统一、抵制中共意识形态的声音。这一生硬的宣言终究没能迎得台湾的人心也不足为奇。一些中国专家和观察者们确实开始对两岸关系持悲观态度。国台办前副主任王在希在2016年12月表示：“实现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对于一心实现统一的人来说，不得已可以采取军事手段来征服台湾，从表面上看这也完全行得通。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成果十分显著，相比之下台湾军队的建设止步不前。中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台湾施行了反介入和区域阻绝战略，让美国很难干预两岸冲突。然而，大规模的水陆攻击战依旧会十分艰难。在控制升级的背景下，解放军仍必须做好与超级大国——美国的军队抗争的准备。不仅如此，解放军还缺乏关键力量——极其重要的两栖舰艇。对任何军队来说，这些不利因素都会让胜利前景变得十分渺茫。而解放军缺乏战斗经验——其最近一次作战是在1979年——更是让困难升级。中国可以选择简单、小风险的军事行动，但是有效性也会大打折扣。导弹轰炸和封锁的确实实现严重损坏，但历史证明强硬手段更有可能煽动仇恨情绪，坚定台湾反对中国的立场。中国只有通过入侵占领，扶持新政权才能确保统一；而当前，这仍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行动方案。

即便中国军队成功入侵台湾并挫败美国援军，军事行动也会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恶化。中国领导人们将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美国和周边地区的态度。一些趋势表明中国入侵台湾可能引起区域性战争。首先，中国国力的增强激起了周边国家的警惕，他们纷纷加强了内部以及与美国的军事外交合作。第二，中国崛起、力量悬殊使得争议中的国家密切关注中国将如何处理争端，以期作为参照。而中国对台军事侵略将会制造恐慌，促使形成制约、打击中国的联盟。

区域合作加强。中国国力持续增强，地区两极分化不断加深，兴起了拉拢中国竞争对手尤其是日本、美国的零和游戏。中美之间虽然竭力维持双边关系稳定、遏制紧张态势，但在外交影响力和经济机遇方面的竞争却日渐激烈。中日间的敌对状态不断升级，甚至掩盖了紧张的中美关系。中国和日本一向在投资工程、外交影响力和对钓鱼岛的控制上存在竞争，和越南在中国南海行动上也有争议。而印度对待中国的态度也越来越警惕。亚洲各国面临上升的紧张局势，都在纷纷加强武装。2015年，该地区的国防开销进入了世界前列。

在这种环境下，各国要么讨好中国，要么与它的敌国抱团。像杜特尔特领导的菲律宾这类东盟国家就在两大力量阵营间摇摆。而其他国家，比

如越南，澳大利亚和印度，在维系和中国的关系的同时默默加强了与日本美国的合作。地区的两极分化促使中国的竞争对手们降低了门槛，对于可能有利用价值的国家都乐于结成同盟。台湾拥有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毗邻中国大陆的地理位置，是抗中同盟的极佳人选。特朗普和蔡英文的通话引起了广泛的媒体关注，美台关系升温，从增强双方军事交流的决定中就可可见一斑。日本和台湾也在民众间建立起紧密联系，以此加强双边关系。比如，2015年的《日美防卫指南》就同意在台海战争或其他冲突中为美军引入日本军事力量的支援。日本近期更是将其在台北的办事处由“国际交流办公室”改名为“日台交流联盟”，此举惹恼了中国。印度和台湾近些年来也逐渐通过贸易和政治访问加强了双边关系。蔡英文于是抓住时机，宣布台湾要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和大洋洲国家的关系。

更多台中争端。中国国力的增强和领导地区的野心意味着台湾的命运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政治的家务事，尽管其政府一直坚称台湾问题属于内政。习近平说中国在领土争端中不会妥协，因此中国决策者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掌控争议领土，而非争夺控制权。第三，中国曾许诺和平解决一切争端。如果中国通过侵略台湾来宣示主权，就等于放弃了当初的承诺。任何国家违背中国的意愿都可能遭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可能会用武力争夺钓鱼岛。印度、越南和菲律宾在和中国的领土争议中也将有类似担忧。即便是和中国相安无事的国家也会开始惶恐不安。亚洲国家也许会更需要美国干预亚洲事务。因此侵略台湾将大大增加反中联盟形成的可能性，并且导致中国安全局势的剧烈恶化。如果随后又发生区域性战争，中国将难以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使国家的复兴事业遭受重创。

结论

虽然2021年前实现统一的希望渺茫，中国也并不具有侵略占领台湾的能力。地缘政治风险加上区域内的两极分化使中国很难有借口攻打台湾。如果中国攻台是因为台湾突然宣布独立，那么国际社会的反响可能不会太过激烈。然而这种宣言并无任何效力，因为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或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承认台湾独立。正因为台湾此举不会有成效，少有国家支持台湾寻求法律意义上的独立。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中国因为台湾拒绝秉承“一中”原则或其他政治条目而实施正当打击。最近有媒体报道，中国政府正考虑修改《反分裂国家法》，在台独问题中划出红线。这些法律可以让中国的军事袭击合法合理。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发动战争的风险极高。亚洲国家只会认为这是中国为侵略所做的政治掩护。毕竟如果任其扩张，中国可以采用相似的方法——也就是强加给邻国难以实现的法律道德要求，之后发动战争——以此逼迫他们放弃任何自己垂涎的领土。

但中国并不是没有机会向台湾展示肌肉。中国政府有能力施行各种制裁让台湾人民的日子不好过，通过加强军事、经济、政治方面的强制措施来破坏台湾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但实施这些策略需要三思，因为把枪口瞄准台湾民众可能会让虎视眈眈的民粹势力得逞，而对于修复台中关系却无半点益处。然而，一旦中国政府黔驴技穷，还是会选择向台湾施加压力，迫使其至少做出妥协姿态，营造一个乐观的统一前景。而台湾增加和中国竞争对手们的往来很可能会换来摩擦更多的台中关系。

美国应该考虑加强干预来确保台湾海峡的稳定。一方面，美国政府应该继续安抚台湾，承诺履行《台湾关系法》中的义务。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需要安抚中国，承诺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台湾也许会迎来更加动荡的台中关系，但只要谨慎处理，仍能确保在未来很多年内维持自治。

www.rand.org

译者 / 杨冰沁

伊斯兰国对中国的威胁有多严重？

Nodirbek Soliev

2017年2月27日，伊斯兰国的媒体组织“al-Furat”在互联网上传播了一条名为《哈里发的孩子》的煽动性视频。这条视频完成于伊拉克西部，主要拍摄了大约三十名在战场打仗的中国维吾尔族士兵，以及二十名训练营的孩子和他们在伊斯兰学校学习的场景。维吾尔族战士们威胁称他们将到中国为被压迫的民族复仇，让血流成河，并在中国插上哈里发的旗子。

这段影片凸显了伊斯兰国的维吾尔族战士日渐强大的军事和战术实力，他们如今前所未有得团结、残暴、野心勃勃。然而尽管事态正不断变化，以伊斯兰国为中心的威胁对于中国的严重程度仍不及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IP），也就是之前人们知道的东突运动（ETIM）。一条煽动视频并不会促使北京严肃重订反恐怖主义方针，因为中国的首要目标是打击新疆以东突组织为首的国内威胁，而不是参与反中东伊斯兰国的国际军事运动。

伊斯兰国对中国的威胁有多大？

伊斯兰国的反华运动主要集中于网络煽动，并未表现出任何对中国进行实地袭击的可能。2014年7月，自从伊斯兰国头目阿布·巴克·巴格达迪将中国列为战场，称要“为新疆受压迫的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发动圣战”之后，中国成为该组织的目标。在那之后，伊斯兰国总共拍摄了三条维吾尔战士的视频和一条普通话录音，目标人群是同情或者反动的观众。这些煽动行为的中心目标是通过公开少数民族教义来雇佣并鼓动维吾尔人，恐吓伊斯兰国的反对者，包括中国和东突组织。

最新的视频是维吾尔士兵首次公开向伊斯兰国表示效忠，这显示出如今伊斯兰国的维吾尔人已经更有组织。然而，伊斯兰国的维吾尔人对中国的威胁主要在海外，特别是在中东和土耳其，而不在中国大陆本身。2015年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处决了一名中国籍人质和一名挪威公民佐证了这一点，这是首次也是唯一所知的恐怖组织对中国平民的刻意杀害。伊斯兰国还在土耳其有维吾尔族的卧底组织，包括应征兵、筹资人和特工，他们可能会被动员而向土耳其的中国人发动袭击。

迄今为止，伊斯兰国在新疆的维吾尔穆斯林人口中还未遇到过多阻力，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的政治煽动和征兵在这里也向来高效。时至今日，还没有报道称在中国或者毗邻国特别是中亚和南亚有任何伊斯兰国的维吾尔成员、积极分子或者归国战士。既然没有执行团队的现身，无论隐蔽或公开，伊斯兰国在中国发动中等或大规模袭击的能力将被削弱。再加上已经很严

格的安保措施和信息管控，伊斯兰国想在中国挑起本土袭击是很困难的。

东突组织仍是主要威胁

TIP 领导中国海内外的维吾尔族士兵长达二十年，对他们的意识形态有强烈影响，因此伊斯兰国并没有机会充分利用维吾尔人的怨恨情绪，也无法通过积极扩张意识形态和征兵活动将他们发展为强大的恐怖组织。在执行能力、意识形态影响、征召士兵和人力资源方面，TIP 比伊斯兰国的维吾尔人厉害得多。即使在叙利亚，当前对中国的恐怖威胁也是从“胜利阵线”（原“努斯拉阵线”）起源，这一组织正是和 TIP 有着稳定的联系。

除在其目前总部和战斗所在的阿富汗及中东地区外，TIP 还向其他地区有所延伸。该组织的跨国网络也在中国、巴基斯坦、土耳其和中亚运作。2016 年 8 月，一群来自叙利亚、土耳其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东突组织、KTJ 和“胜利战线”成员在中国驻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大使馆发动了自杀式汽车爆炸袭击。在此次自杀式袭击中有六人受伤——三名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及三名中国大使馆员工——凸显了 TIP 对中国发动精密预谋式袭击的能力，即使在吉尔吉斯斯坦这样边远且安全的国家也不例外。

伊斯兰国的维吾尔成员一直在向 TIP 流失。华盛顿的研究机构“新美国”发布的 2016 年度报告显示，114 名维吾尔人加入了伊斯兰国，然而 TIP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便有 1000 至 2000 名维吾尔战士，这还没有包括其在阿富汗拥有的维吾尔士兵。仅在 2016 年一年，TIP 就发布了超过 200 条维语的视频和音频煽动材料，这些文件通过极端基地组织传播网络“全球伊斯兰媒体前线”（GIMF）广泛传播。

伊斯兰国宣传以 TIP 为目标

伊斯兰国的煽动性宣传目的在于通过震慑对手并削弱其权威来动员并征召更多的维吾尔士兵，其对手也就是 TIP。一名在伊斯兰国最新的视频中出现的维吾尔战士批判并谴责了 TIP，称其为“叛教者”，劝阻维吾尔人不要加入该组织。在不同镜头中，一名维吾尔战士和一名青少年在儿童面前残杀并击毙了两名匿名“告密者”。这是维吾尔士兵首次公开效仿伊斯兰国式的荒诞处决场面。

这种公开的残暴有其清晰的心理、战略和意识形态目标。一方面，该组织用残暴标榜自己，从而动员并征召与之为伍的维吾尔人；另一方面，公然揭露其血腥是威慑战略的一部分，目的在于阻止维吾尔人从伊斯兰国叛变到 TIP，特别是在伊斯兰国当前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遇到的重大军事阻挠中。

中国的应对：将会到来的是什么？

伊斯兰国谴责中国对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士的态度，并警告称将对中国

发动袭击，北京对此应该十分警戒。视频发布以来，中国政界已作出各种回应。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建造“钢铁长城”保卫新疆，安全与反恐怖主义部门称伊斯兰分裂分子对中国的稳定与安全造成了最重大的挑战。中国外交部强调其愿意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然而，中国似乎并不会参与国际社会在中东的打击伊斯兰国武装行动。由于其长期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方针，北京一直避免介入海外争端，尽管其向叙利亚政府提供过外交支持。

但是无论伊斯兰国是否对中国形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北京似乎都将以这次想象中的危险为理由，加强对新疆的安全镇压措施。新疆目前正受困于低水平的民族主义分裂分子冲突和长期的本地维吾尔和汉族的民族间矛盾，伊斯兰国的挑衅也许正给了中国政府机会，在这个饱受磨难的省份颁布进一步的法令。

www.rsis.edu.sg

译者 / 周沐阳

中国政策目标让步政治转型

Michal Meidan

虽然中国看似在为经济减速与更强有力的环境政策做准备，但是这两者可能都会因为政治决策的考虑而让位。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布了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政府已经明确表态：经济增速将会放缓，信贷狂潮已经彻底结束，“蓝天白云”指日可待。这些话，可信吗？

经济增长仍有回旋的余地

乍一看，通篇工作报告都在讲述经济放缓与财政紧缩，但是仔细研究后就能发现，为了防止经济衰退，报告中还是留有余地让政府出手支持经济的增长。

许多人聚焦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相较于2016年的6.5%到7%，今年目标则定于6.5%左右。但是进一步观察就能发现，如果政府有必要助力经济增长，完全可行，因为报告中给出了足够的余地。比如，在确定GDP目标之后，李克强总理也曾声明应该努力取得更高的经济增长。同时，虽然政府方面声称赤字比率会被控制在3%，但这个数据可能会更高，因为2016年的赤字率达到了3.8%。就实际情况来说，政府赤字会稍稍扩大到2.38万亿人民币（3400亿美金），而2016年的目标赤字则是2.18万亿人民币。

显然，共产党代表大会依然是今年最重要的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有机会指派亲信到政治局，以此巩固自己的影响力。政府想要确保一切程序都顺利进行。即使北京方面已经清楚认识到体制上存在的风险，并且会对此采取行动，重中之重仍然是防止经济下降过快。

空气污染：政治的代价

政府工作报告还强调了处理污染和提升能源利用率的重要性，李克强总理也承诺“重现蓝天”。但是，虽然对于污染问题的话语强硬，实际上对于煤炭产量的限制可能会比2016年更少。

北京计划今年减少1500万吨装煤量，国家发改委则进一步承诺关闭或者停止建造相当于500亿瓦特电量的燃煤厂，同时减少3.4%单位GDP的能源消耗。但是这些比起2016年减少2900万吨装煤量的做法，远远没有那么强硬。可想而知，2016年的这种做法成功使煤炭的生产量同比下降9%，但是也导致煤炭的价格激增了66%，到头来，政府也只能放宽采矿限制。今年，虽然空气质量是各方最关注的焦点，但是对于北京来说，

最重要的是稳住煤炭价格，这一点，即使国家发改委不多做解释，各方都已心知肚明。

当然，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继续顺利发展，期间不出现插曲，政府就会处理正在恶化的空气质量问题。今年应该会有新的规章制度来进一步减少煤炭的生产与使用。据说，国家环保部已经开始实行新的制度草案，在中国第二大煤炭交易中心，天津，禁止煤炭运输。到九月底，河北省的港口将不允许卡车从铁路向船只装载煤矿。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与多个政府部门和企业集团磋商之后，这项草案势必会被修改以进行妥协。虽然政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出了诸多承诺，但是今年只有一件事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政治转型。

www.chathamhouse.org

译者 / 钱王杰

中美通力合作解决朝鲜问题的内在逻辑

裴敏欣

在东亚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之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即将到来的东亚之行透射出了通过外交途径而非诉诸武力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丝曙光。

对于蒂勒森来说，这对他外交手腕将是一场艰难考验，但对于蒂勒森协调出一个地域联盟来解决朝鲜问题的前景并不看好。蒂勒森将于周五访问韩国，但韩国目前政局动荡，总统朴槿惠正深陷弹劾危机，各政治团体对于对朝政策也无法形成统一。另一个出访国日本作为美国坚定的同盟国，对于美国提出的建议应当会提供无保留的支持，而中国，无疑将是此次东亚之行最艰难的一环。

中国的对朝政策一直让美国感到烦恼，由于中国对朝鲜持续提供帮助，因此只有中国有能力对朝鲜施压以引导朝鲜的行为回归正常。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最近几年对朝的政策也逐渐回归了中性，比如说，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朝的制裁决议，并在最近的几个月里暂停了从朝鲜进口煤炭。

然而，总的来说中国对于那些能够导致朝鲜经济崩溃和政治垮台的制裁措施仍然保持谨慎态度，虽然一个拥有核武且随时可能试射导弹的朝鲜政权不被中国政府喜爱，但一个统一且与美国利益一致的朝鲜半岛是更不能接受的。

在这样的政策逻辑下，中国政府更倾向于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而不是对朝鲜单方面施加压力。而近来美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因军方担心萨德的部署将会削弱中国的核威慑能力。在过去的二十年来，韩国一直小心保持着地缘政治的微妙平衡，一方面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一方面与中国进行大量经贸往来，但是目前看来这一平衡已难以为继。中国正在向韩国就部署萨德一事施压，如减少赴韩旅游团数量及禁止韩国艺人入境，并且在3月9日，中国关闭了乐天在华近一半的门店，乐天是目前韩国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

表面上看，中国作为韩国最大的经贸伙伴，似乎有许多强硬的手段可以施展以迫使韩国在某些问题做出让步。2016年，韩国向中国出口了1240亿美元的货物，获得了37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另外，中国赴韩旅游人数也达到800万人次，花费超过190亿美元。另一方面韩国的政坛巨变也为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主张对朝鲜实行强硬政策的朴槿惠政府已然倒台，而左翼反对党有可能组成新一届政府。因此在中国政府的预期中，韩国将因为无法承受部署萨德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而取消部署萨德的计划。

然而，细想之下中国的施压政策可能并不会奏效，即使韩国左翼反对

派把持朝政，依旧很有可能坚持部署萨德系统。出于安全和经济方面的考量，韩国会更倾向于美国，而非中国，军事上，中国无法像美国那样提供安全保障，经济上，美国是韩国的第二大出口国（2016年，韩国向美国出口了大约700亿美元的货物），韩国与中国结盟而放弃进入美国市场的可能性并不大。

鉴于中国政府的惩罚性措施，韩国政府可能会重新评估和衡量对中国的经贸依赖，同样的，中国的周边国家也可能会重新考量和中国经济关系过于紧密而带来的隐性风险。

蒂勒森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来提升此次东亚之行的成功几率，除了需要向韩国重申美国方面将会提供毫不动摇的支持外，蒂勒森还需要向中国领导人传递信息：与美韩日合作共同解决朝鲜问题，才是应对朝鲜日益强大的核能力以及缓解半岛紧张局势最有效措施。

fortune.com

译者 / 徐佳炜

蒂勒森、中国及朝鲜问题

Christine Guluzian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的第一次访华之旅于本周末结束。在此之前，他访问了韩国和日本，作为东亚之行一部分。对朝政策不出所料成为本次访问的讨论焦点。

近来朝鲜政府进行的一系列导弹发射，包括落在日本海的那枚更先进的弹道导弹，是同时在试探美国政府及中国政府的忍耐力。确实如此，就在蒂勒森周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几个小时之前，朝鲜官方媒体宣布了新型高推动力的火箭发动机试验，这一项目由金正恩亲自监督，并称其为朝鲜火箭事业的“新生”。因此，中国有多大可能会支持美国改变对朝政策呢？

蒂勒森近期到韩国的非军事区考察后不久，宣布美国已结束对朝的“战略容忍”。这次声明是在蒂勒森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岸田后发表的，在会见岸田时他指出，“过去 20 年间，为实现朝鲜去核化所采取的一切外交手段和其他努力都失败了”，并且“现在必须采取其他方式了”。根据《华尔街日报》在本月的报道，这与副国家安全顾问 K·T·麦克法兰的要求相一致，麦克法兰希望美国重新审视对朝鲜的政策，包括政权更迭的人选，以及实行“直接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对于美国将对朝采取“不同”政策，日本和韩国毫无疑问会表示支持，但是中国对此的接受程度尚不明朗，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其中部分政策制定者甚至还不能确定，中国到底应该是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还是“战略竞争对手”。

这对于美国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了，奥巴马政府最终也未能在亚洲地区实行权威和紧密合作的政策，即使他多次尝试推行“重返亚太”政策。在乔治·W·布什就职总统之前，曾抨击克林顿政府与北京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宣布将把中国当作“竞争者”看待。

而本周末蒂勒森的态度则大相径庭，他称中美关系原则应该是“无冲突无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这也与中方的表达相似。此外，蒂勒森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在朝鲜问题上相互表示了愿意合作的态度。但是，在采用军事方式对待朝鲜问题这件事上如果美国想得到中国的支持，还有几个困难。

首先是本月初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问题，中国认为“萨德”反导系统将对其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并就此坦言其顾虑。如果特朗普政府欲寻求与中国合作应对来自朝鲜的威胁，“萨德”反导系统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合作陷入僵局。

另一个因素是，如果对朝采取军事手段可能会引起动荡。以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为鉴，军事冲突是不可预测的，包括其后遗症的严重性。尽管排除核方面的威胁，政权更迭或军事冲突将对中国政府造成危险和动荡。毫无疑问中国政府会更倾向于采取更谨慎的做法。确实，中国一再要求重返由朝鲜、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美国组成的六方会谈，当初奥巴马拒绝了这一请求，现在看来特朗普更不可能接受。

把军事手段放到台面上讲，特朗普政府试图就势推动中国对朝鲜一事采取进一步行动。毕竟，朝鲜近日的挑衅迫使中国政府停止本年度向朝鲜进口煤炭。这对中国来说是大胆的一步棋，出口至中国的优质炼焦煤贸易额占朝鲜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很大一部分。考虑到中国采取的这些措施，特朗普政府更加确信中国会做出更多努力来“驯服”不可预测的朝鲜政权。采取这一做法的风险在于，特朗普及其政府过去对中国过于敌对，因此有可能误判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毕竟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和当选总统之前已有一些人发表对中国政府强硬的言论。因此，美国政府可能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的敌对关系，反之使中国可能成为朝鲜有利的合作伙伴。

在考虑对朝鲜采取“不同的方法”的同时，美国依然在执行对平壤的经济制裁。近来，韩国和美国一致决定在制裁上加强合作，并承诺配合联合国制裁的后续行动。结合中国禁止进口朝鲜煤，这对平壤经济的总体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尚未完全确定。

这归结于美国在军事手段选择和外交解决方案的权重。如果美国想要把中国列为合作伙伴，就需要明智地利用资源和关系，而不是仅靠武力。

thediplomat.com

译者 / 李雪莹

土耳其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研判

张红 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青年研究员

2017年2月14日，应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的邀请，法国里昂商学院副校长图格鲁尔·阿塔梅尔（Tuğrul Atamer）教授来访，就土耳其复杂的历史经纬、分裂的社会现状及其在我“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评估和分析。阿塔梅尔教授系土耳其裔法国人，因其双重身份，所以能为我们还原和呈现土耳其的复杂历史和分裂的社会现状，并同时能从法国和欧洲的视角为我们提供建议和意见。

一、土耳其在我“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优势分析

在阿塔梅尔看来，土耳其因其独一无二的地缘优势，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有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

1. 土耳其处于“一带一路”的中部走廊地带，地理优势独一无二。土耳其处于欧、亚、非三洲中心，尤其到2050年，伴随非洲经济的增长，土耳其作为世界中心的作用将更为凸显。在过去的10年里，土耳其航空公司拥有多条国际航线，成为往返于欧亚之间重要的交通枢纽，同时，现在土耳其正在倾力修建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

2. 得益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物流优势，土耳其将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阿塔梅尔援引纽约大学 James Hsiung 教授的话，认为全球经济的中心将由欧洲大西洋转移到亚洲太平洋，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其联通都需要通过土耳其。

3. 土耳其积极拥护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时对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乐见其成。在过去的两年里，土耳其政商学三界热议“一带”战略，希望凭借该战略重现昔日安那托利亚的荣光，大量相关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也得以召开。土耳其政府在基础建设方面也进行了大量投资，包括修建铁路、国际机场、桥梁和海底隧道，建设了联通欧亚的两段高速公路并增加贸易往来。

二、土耳其：复杂的历史经纬及分裂的社会现实

阿塔梅尔认为，土耳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国家，但不容忽视的是，其独特的历史经纬及复杂的社会现状却也给我“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 土耳其的历史和地缘之间的断裂性。土耳其的历史究竟是从中亚人大规模的迁徙开始，还是从安纳托利亚民族开始，抑或是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总之，土耳其的历史是在破坏16个帝国的

过程中展开的；1900-1923年，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土崩瓦解，土耳其原有人口中有75%消失，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土耳其的人口结构和社会文化基础，同时，共同记忆和共同能力的缺失使得土耳其的国家认同成为一大问题。

2. 存在多元身份认同及日益分裂的社会结构，包括由于语言、人种、宗教信仰等差异所产生的文明断层线等问题。早在19世纪中期，土耳其就已出现了身份认同的危机，今天，土耳其东南部和西北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断裂线。而土耳其最近几年的政治生态则更可见一斑，分裂的社会结构使得土耳其的国家治理异常艰难。

3. 与其地理位置类似的地缘政治问题。土耳其受到东西方两个地理板块和欧亚两洲的双向挤压，其外交战略也面临类似的处境，究竟是向东还是向西发展，一直是土耳其外交战略上的一个难题。

4. 从经济视角来看，土耳其的经济较多依赖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市场，具有较大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尽管作为E7之一员，土耳其经济发展具有很大潜力，但由于其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主要依赖外部资本投资，导致经济增长很不稳定。此外，土耳其向创新型经济转型之路也困难重重。

三、政策建言

总体而言，基于土耳其的地理和物流优势，其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同时其国内分裂的社会结构、脆弱的经济基础以及复杂的政治生态等都构成了我“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的战略阻力，如何让土耳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因素而非为“一带一路”带来危险之旅，我国政府的因应和政策调整显得尤为重要。

1. 加强对土耳其基本国情的认知和理解，换位思考，制定相应策略有效对接。一国的外交政策是其国内政治的延伸，一国对外经济政策亦是其国内经济结构的向外诉求表达，而国家内部社会结构也会对其经济和政治政策的实施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土耳其这个政党纷争严重、军政关系复杂、宗教信仰多元、共有文化缺乏的欧亚大国而言，我“一带一路”倡议想要顺利实施并规避其国内不稳局势的溢出效应，亟需加强对其基本国情的认知和理解，深化对其相关方面的知识储备。在此基础之上，换位思考，力推“一带一路”倡议与其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或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处理好中国-美欧-土耳其的关系。西方大国的影响力渗透在土耳其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必须处理好中国-美欧-土耳其的关系。通过阿塔梅尔教授的此次演讲，能够感受到以他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土耳其问题专家对于我“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高度欣赏，但同时他也指出有大部分欧洲人并不关心和在乎我“一带一路”倡议。在他看来，就欧洲而言，施罗德之后就已不再有欧洲愿景，非洲也缺乏动力，而中国却具有这一联通三

大洲的宏大愿景，这令人赞叹。中国完全可以依托“一带一路”，以实际行动让欧洲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欧洲可以借此建构一种新的平衡，以维持和平，毕竟中东乱局以及大国在中东的博弈并非利于中东人民之福祉。

3. 处理好中俄土三边关系，能更好地服务于我“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俄罗斯与土耳其有着百年的恩怨情仇，近两年来，基于双方的互相需要，土俄关系从剑拔弩张走向了携手合作。同时，俄罗斯与我国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一带一路”倡议在土耳其的落地推进过程中，如何最大程度地获得俄罗斯的支持和推动也至关重要。

中印竞赛新赛场——佛教

Jayadeva Ranade

对中印两国而言，佛教文化一直都是推动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强大助力。印度在过去十年十分重视佛教发展，政府正在努力重振佛教传统，并将其融合为国家文化实力的一部分。同时，对中国来说，佛教文化也是缓和国内矛盾，避免国家分裂的重要安定剂。中国政府开始将佛教形容为“古老的中国传统宗教”，尊重公民信仰宗教的权利——因为在维护国内社会安定和安抚西藏自治区和其余藏区的情绪上，佛教的影响至关重要。中国还利用佛教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在许多权威佛教组织中都占有关键席位。而佛教起源国，印度则将佛教文化视为加强其于南亚盟友的手段，并以此保护在印度谋求庇护从事宗教及文化活动的西藏佛教成员。

达赖喇嘛的重要性

一直处于关注焦点的是十四世达赖喇嘛——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即教内最高领导，同时也是当今佛教传统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当世达赖喇嘛年事已高，选定继任的转世活佛也迫在眉睫。中国将此视为解决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之间矛盾的契机，从而加强对藏区的控制。中国政府官员已公开宣布，下一任达赖喇嘛将由中国政府在中国公民的人选中选任。

由于其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几个世纪以来，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之间一直摩擦不断，连续几任达赖喇嘛都反对中国政府在藏区的主权。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历史上历代君王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公元七世纪时，古代中国的文成公主，唐朝太宗唐氏的远支宗室女，与传佛教入藏的松赞干布成婚。文成公主入藏一直被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视为中央开化西藏及加强其在藏区影响的重要举措。

几世纪后，在 1950 年，西藏归入中国版图，但中国领导层一直未能平息藏区动荡，也无法赢得藏民支持，承认中国地位。事实上，中国中央政府一直担心藏区会爆发分裂主义运动。因此，北京方面一直力求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世时回国，标志着中国对藏区的主权得到了认可，但一直没有成功。中国政府继而谋求选定下一任达赖喇嘛，以控制其领导下的藏传佛教各阶层。除了达赖喇嘛，中国国内还有班禅喇嘛——藏传佛教中第二最高领导人，和另外 870 位仁波切（活佛）。

印度的佛教政策

和中国一样，印度和佛教也有不少历史渊源，现代决策者也可乘此东风提升国家软实力。尽管看似无关，但实际上，几世纪以来，佛教在印度

与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中一直都是重要基础。佛教发源于印度，也是印度精神遗产。印度最鼎盛时，僧人和学者会出行各地传播佛教文化。他们的足迹从西藏和中国一路延伸到日本，接着继续经斯里兰卡进入东南亚。尤其是藏传佛教，一路北传到西藏和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小乘佛教学院也在南亚和东南亚蓬勃发展。

时到今日，佛教对印度的影响依然随处可见，如艺术、文化和建筑等。印度独立后，将阿育王石柱的三狮采纳为国徽，由此可见佛教对此国及其人民的影响之大。直到 2011 年，印度国内还有超过八百万佛教徒。

印度也有相当数量的藏民，因此和藏传佛教也有联系。第一波藏民入印潮是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入印同期，即 1959 年 3 月。在 1950 年中国将西藏纳入版图，1959 年达赖喇嘛逃往印度，许多高级别的藏传佛教领导、贵族和普通藏民跟随他的脚步，主要经尼泊尔入印。当前，十四世达赖喇嘛，藏传佛教的四大派系首领（即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和萨迦派）和不少级别较高的西藏喇嘛依然留在印度，但四派的主要寺庙都在西藏。

佛教在印中外交中的作用

近年来，印度一直在推广佛教思想文化。在 2011 年 11 月，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一个名为全球佛教大会（GBC）的组织机构将众多传统佛教的代表人物汇聚到了一起。在新德里举办的全球佛教大会上，有超过九百名法师、尊者以及不同流派的高级僧侣出席——这是自阿育王时期（公元前 268-232）以来最大型的佛教领导集会。出席的各首领达成一致，认为佛教需要一个中央机构负责佛教相关事宜，如维护不同派别的传统和宗教活动等。大会的成果之一是成立了国际佛教联合会，负责继续推进研究及传播佛教修行及传统。

在几年前，中国就开始举办自己的国际佛教大会，即世界佛教论坛（WBF）。第一届世界佛教论坛于 2006 年在福建省举办，接下来三届分别于 2009 年在江苏省无锡市、2012 年 4 月于香港和 2015 年于无锡举行。举办世界佛教论坛的一个目的是向中国和邻国的佛教众传达一个信息：中国共产党认可佛教的地位。数不胜数的佛教僧侣、学者和其他相关人员都接到了世界佛教论坛的邀请，包括一些在印度的佛教人员。从这些定期举办的集会可以看出，中国一直在努力提升班禅喇嘛的地位——藏传佛教第二最高领导人，由中央指定。中国希望佛教徒能承认班禅喇嘛的合法地位。中国政府并未邀请达赖喇嘛出席世界佛教论坛，称其为“不稳定因素”。然而，2011 年于印度举办的全球佛教大会使得中国政府的努力大打折扣，2012 年举办的世界佛教论坛也相对冷清。

有时候，藏传佛教也会唤起人们对当前中印边界争端的注意。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流亡印度的另一位藏传佛教重要人物，于 2016 年 11 月访问了印度阿鲁纳恰尔邦。他是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认可的大宝法王，即藏

传佛教噶举派首领。中国在印度政要和达赖喇嘛访问阿邦一事上尤其敏感，认为这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达赖喇嘛计划在 2017 年 4 月访问阿邦，中国政府认为这是出自印度政府的意愿，不顾中方抗议宣示主权。在 2017 年 3 月，印度在那烂陀举办了一场佛教大会，意在进一步聚集更多的佛教喇嘛。大会由印度文化部主办，召集了超过三十国的佛教僧侣来参加，包括孟加拉国、柬埔寨、斯里兰卡和越南等。据估计，那烂陀大会将进一步提升印度在佛教界的地位。

与此同时，自 2014 年纳伦德拉·莫迪出任印度总理起，印度政府一直利用佛教文化来推进双边关系，尤其是与日本和蒙古的关系。莫迪总理将佛教纳入了印日外交活动。例如，2014 年 8 月，莫迪总理访问了两所日本国内的古佛寺，且在接下来一次访日后，于同年 11 月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还提到了佛教。私人机构也参与了佛教外交。比如，2015 年 9 月，国际佛教联合会、维维卡南达国际基金会和日本东京财团共同举办了一场为期三日的佛教和印度教内部会议，讨论如何避免更多冲突及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

佛教在印度和蒙古的外交关系中也发挥了不少作用。在 16 世纪后期，是蒙古元首俺答汗首先授予了格鲁派僧侣索南嘉措“达赖喇嘛”的称号，后世达赖喇嘛也一直寻求蒙古元首的支持。蒙古和达赖喇嘛之间独特的联系也是印度总理莫迪 2015 年 5 月访问乌兰巴托的重要原因之一。莫迪总理在国事访问中也多次提及了印蒙之间的佛教联系。总理在蒙古议会的讲话中提及了释迦摩尼和佛教七次，且访问了甘登寺，而这只是其中两个例子。

蒙古和达赖喇嘛之间的特殊关系有时也会使得蒙中关系复杂化。在 2016 年 11 月，蒙古不顾中方严肃警告，迎接了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专门利用了这四天访问蒙古的机会来行使其宗教权威，承认了第十世活佛，藏传佛教第三最高领导喇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的地位，后者现在居住在蒙古。

相比之下，亚洲其他国家，如缅甸、韩国和越南等佛教色彩浓厚的国家，却没有允许达赖喇嘛的访问。特别是缅甸和越南，尽管重视佛教，秉承小乘佛教的传统，但两国没有无视中国政府在达赖喇嘛一事上的敏感。和中国一样，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国内共产党允许民众信仰宗教，且许多党员也是佛教徒。韩国则信奉带有韩国特色色彩的大乘佛教。

中国政府努力扩大对藏传佛教政治的影响

自 1980 年起十四世达赖喇嘛开始四处窜访各国，宣传西藏问题，为藏民游说。中共的反应则是将其定义为“分裂分子”。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长，对达赖喇嘛的反对也更为强硬。从 2007 年起，中国就一直努力降低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并通过对外国元首和政府施压，不让别国

接纳达赖入境，孤立达赖喇嘛。若有国家不顾中国反对，中国会采取惩罚措施，减少对该国的直接投资或出口，至少持续六个月到一年。不仅如此，中国还会暂停与该国的外交联系，直到该国道歉。中国政府在过去几月中加强了政策管制，包括与司政（流亡藏区总理）会面。自2007年起，达赖喇嘛问题愈发显著，成为了中印在官方轨道和费官方轨道交往的冲突的主要来源。

中国的担忧加重有几大原因。中国政府相信，其认为的外国敌对势力会利用藏民来造成国内动荡。中国希望避免有两位达赖喇嘛及班禅喇嘛的情况，政府担忧这会使得国内冲突进一步加剧。班禅喇嘛一事是指由十四世达赖喇嘛指定的班禅喇嘛正被中国拘留，不让他在公众面前出现，同时试图说服藏民承认政府指定的确吉杰布为班禅喇嘛。中国一直努力说服十四世达赖喇嘛回到“祖国”“安享晚年”。

中国还努力证明自己是一个有强烈佛教渊源的国家。在2008年，中国考古学家发现了佛祖头骨，存放在由檀香、黄金、白银和宝石制成的舍利龕中，后移交江苏省内的一所佛寺入土。

中国在降低达赖喇嘛影响力上做出了许多行动，其中还包括支持雄天宗的礼拜活动，这是达赖喇嘛于1996年禁止的。中国政府支持雄天宗信徒，批准了大笔寺庙补贴，还怂恿印度和其他地区的雄天宗信徒起诉达赖喇嘛，组织抗议活动对其进行骚扰。中国政府甚至还邀请了藏传佛教中显要的雄天宗僧侣，或反对达赖喇嘛的僧人，前来参加和平解放西藏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使达赖喇嘛难堪。

而且，中国一直努力对藏传佛教的分支派别施加影响，在潜移默化中使他们与达赖喇嘛断开联系。中国政府一向偏爱噶举派，教众大量分布在西藏的西部，印度的喜马偕尔邦、拉达克和锡金，以及不丹。驻扎在查谟和克什米尔的记者称，中国还悄悄支持在拉达克的竹巴噶举仁波切——他毫不隐瞒自己对达赖喇嘛的不满，并要求支持者不要在达赖喇嘛到拉达克时前去捧场，也不要出席达赖喇嘛的教课。

中印邻国的佛教现状——以尼泊尔为例

中国一直利用佛教来扩大其在周边国家的地区影响，尼泊尔是其中之一。中国对尼泊尔的关注主要由于其境内居住的两万藏民。另外，原来在西藏和尼泊尔北边边境接壤处也居住着许多藏民。中国非常担忧“敌对国外势力”——暗指美国和印度——以尼泊尔为基地扰乱藏区秩序。中国不断扩大其在尼泊尔的影响力，驻尼泊尔大使馆现在直接和尼泊尔警方合作，限制尼泊尔藏民的活动。中国尤其关心蓝毗尼，佛祖的诞生地，就在尼泊尔境内，紧靠印度边境。一位高级中国官员曾向尼泊尔记者透露：“中国政府访问尼泊尔，就是因为尼泊尔有蓝毗尼，佛祖的出生地。”

尼泊尔成了中国监控（至少是影响）藏传佛教领导动态的基地，且中

国成功阻止了达赖喇嘛进入尼泊尔。事实上，就在 2012 年，当时的尼泊尔文化部长，米兰德拉·里贾尔，透露出达赖喇嘛可能将会访问蓝毗尼，并且表示“中国领导人一定会尊重人民的意愿，妥善解决达赖喇嘛问题”。同时，在取得中国政府同意后，尼泊尔允许藏传佛教的萨迦派及其分支成为唯一一支能在蓝毗尼举办传昭大法会的派别。宁玛巴派也得到了北京的同意，拥有选认高级僧侣的权利，并在 2014 年，通过一系列中国政府颁布的手续后，取得中国政府支持，认可了贝诺仁波切的转世和继位。

在 2014 年中期，噶举派也和中国政府进行过协商。噶举派坚持在尼泊尔为夏玛仁波切——第十四世夏玛巴，藏传佛教传统噶玛噶举派中第二最高精神领袖——举行最后的仪式。最初，尼泊尔驻印度大使馆同意了，但在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的压力下撤回，因为本计划由达赖喇嘛代表护送遗体到加德满都，并会同藏民准备在加德满都博达哈大佛塔的集会——这一切都是中国反对的。后来，尼泊尔再度同意了此项安排。

中国于 2011 年 6 月首次公开对蓝毗尼的兴趣。当时有一个中国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APECF），向尼泊尔政府提出了一个三十亿的项目发展蓝毗尼。该项目包括建设酒店、机场和由中国管理的佛学院。肖武男，中国共产党资深党员，曾任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西部地区副委员长，于去年退休，现任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执行副主席。现尼泊尔总理帕苏巴·卡麦尔·达哈尔（即普拉昌达）出任基金会副主席则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对尼泊尔的关注程度之深。

亚太基金会的提案被搁置了，但尼泊尔政府也不想拒绝中国的提议，由普拉昌达领导，成立了蓝毗尼开发委员会，便是最好的证明。为了拉到更多发展蓝毗尼的支持者，中国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一直努力和尼泊尔政要合作，并任命马达夫·库马尔·内帕尔和苏加塔·柯伊拉腊出任中国非政府组织董事。在 2013 年，中国佛教协会（主席是中央选派的班禅喇嘛）宣布了一系列接管蓝毗尼项目的计划。相比之下，中国佛教协会的方案比亚太基金会范围更小，但一切也依旧处于计划阶段，未付诸实施。

另外，在印度 - 喜马拉雅一带还遍布藏传佛教寺庙，其对当地居民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像拉达克的希美寺，和阿鲁纳恰尔邦的达旺寺，都拥有大量资产和土地资源，后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演变成中印协商中的棘手问题。中国试图在蓝毗尼建立佛学院，免费为年轻僧侣提供教育。结合这些来看，中国很有可能将利用这一切来增强其在印度北境的影响力。

不管是达赖喇嘛的支持者，还是中国政府，还有别的担忧。不少权威报道显示达赖喇嘛自身的管理层中已出现明显分歧。在支持达赖喇嘛的外国人以及海外支持西藏独立的组织中间，有一种观点正在悄然兴起：印度藏民正在试图从同情达赖喇嘛的群体那里攫取全部的政治权力。持该观点的人没有挑明的是，他们认为政治权威应该共享，但他们没有明确指出与谁共享。中国国内，佛教徒数量快速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也显得更加

焦虑。最近有报道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加强对佛教僧侣活动的监控，特别是对于藏传佛教僧侣的监视，同时也实施了不少规定以限制他们的活动和准许拜访的地点。

佛教是印度精神遗产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佛教也能帮助印度巩固与东南亚各国的联系。同时，有了藏传佛教各分派首领，印度的佛教文化能得到进一步丰富，且印度得以与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建立更深刻的联系。中国人口分布的变化使得佛教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领导层认为，藏传佛教中重要宗教人物回归中国，对维护国内安定非常重要。可以预见的是，中国政府将持续努力增强软实力，而手段之一就是宣扬其深厚的佛教遗产，深化与国内外佛教各界的联系。

carnegieindia.org

译者 / 周雪怡

东盟应对中国的言不由衷

Tang Siew Mun

过去一年，东盟 - 中国之交饱经风霜。本应庆祝双方开启对话 25 周年的庆典，也被在中国南海问题上的纠纷淹没。这一切无疑对东盟 - 中国关系是巨大的考验，但这段持续了二十五年的外交关系，其之深之广都足以让各方扛过这次风波。

双方的友好和善意最终胜过了意见不合，上周三举行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则是最好的证明——这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

在大会尾声的媒体发布会上，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对东盟 - 中国关系表达了积极乐观的态度。

在另一次发言中，李总理肯定地表示，在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中，东盟将处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而这一讯息在东盟方面也得到积极回应。李克强总理还强调了中国对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坚定支持和重要地位。

李总理还借鉴东盟的做法，赢得了不少东南亚国家的欢心。李总理公开表示，中国不想看到有任何国家因受迫而站队，冷战时期已经过去了。

确实，东盟被夹在美中斗争中进退两难，首脑们已多次表明他们的不满，看上去这一抱怨终于传到了中国领导人的耳朵里。

对于中国南海问题，李总理表达了对纷争解决的希望。中国希望能通过各直接利益方及区域各国的对话解决具体问题，并一起合作，为和平、稳定和发展努力。

总的来说，李总理的话对于东盟 - 中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是个好兆头，但到底中国是否会言行如一，谁也无法打包票。

恰在此时，李总理安抚东盟的话就迎来了第一次考验。《海南日报》，一份国有报纸，引用了三沙市市长肖杰的话：地方政府应在黄岩岛建立一个环境监测站，扰乱菲律宾。《华尔街日报》接着就报导称“文章中那些意指黄岩岛的话已被删去，证明此声明并非为官方消息。”

但三沙市市长的话不应被忽视。三沙市是中国政府于 2012 年新建立的行政区，来管理中国在中国南海地区的海上利益，市长肖杰便是最通晓中国政府对于争议海域策划的高级官员。

市长的失言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市长肖杰只是一位心直口快的行政区官员吗？他过早的发言是否真是草率之举？这些猜测都令人不安，尤其是以下两方面。

首先，假设该发言是出于地方官员的野心，那这些话就预示着中央政府对于下级地方政府的把控丧失。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地方官员自作主

张的事件层出不穷，有时候还危害到国家利益，即所谓的“山高皇帝远”。具体到中国南海问题，地方官员逾矩之举很可能与中央政府的打算产生冲突，极有可能导致事态产生巨大变化，而中国中央为了应对新现实，不得不改变原有计划。当然，令人稍感安慰的是，此内容有误的文章已被大体订正，证明中央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阻止进一步损失。

不管如何，这一出闹剧证明了大众普遍的猜测：最高层的战略和决策往往不能完整落到实处，也侧面支持了一个盘旋的传闻：东盟 - 中国关系之路崎岖实为无心之过。

第二，市长肖杰撤回的言论仍有可能伤害中国与菲律宾的关系，假如中国对黄岩岛起心，可能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也将受损。

中国的实际行动与当初对外宣称的政策有较大差别，这也引发了不少猜测，认为针对“行为准则”的协商被延长只是在为中国争取时间，来扩大及巩固其于中国南海区域的布军。

黄岩岛引发的纠纷对中国与菲律宾及东盟的关系有着深远影响。假如中国进一步强化其在黄岩岛的主权，菲律宾很有可能进行强力阻止。中国对“红线”的不断挑战，很有可能最后和菲律宾在仲裁法庭上针锋相对。菲律宾 - 中国关系假如走下坡路，会对菲律宾的东盟轮值主席国地位有较大影响。

许多迹象表明，东盟成员国对于中国南海事态的发展也感到不安。在2月21日的东盟外长会议后，会议主席发布了新闻稿，强调“对近期中国南海区域的事态演变和升级，有许多外长表达了忧虑，因这一切有可能进一步使区域形势紧张化，且危害区域内合作伙伴的信任和信心。”

中国需要做的，是将国家安全利益与外交姿态相对应，并做到言行一致。所以，黄岩岛一事对中国南海各方及东盟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对于中国南海各方，黄岩岛事件提醒了他们，真正的双边协商，实际看的是国家实力哪方更强。对东盟来说，中国的言行不一，则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得出不同的教训。

不论如何，尽管东盟和中国都尽力避免聚焦中国南海，纷争不会因此而淡化。当东盟和中国都致力于圆满完成对“行为准则框架”的协商，要想落到实处，双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各方都需积极应对问题，寻求以外交手段解决矛盾的空间。

www.iseas.edu.sg

译者 / 周雪怡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缘何欧洲国家仍犹豫不决，如何使之发挥作用

Andreas Grimmel, Susanne My Giang

区域融合项目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今世界，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各种区域融合项目有力地塑造着几乎所有地区。然而，区域融合不仅影响其参与者和民族国家，同时也影响着不同区域间的关系。中国于2013年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在现今区域融合的趋势中具有新的里程碑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计划宏大，志在通过全面的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联通亚欧；第二，囊括众多国家，可能会包括多达六十五个国家；第三，除了区域内部融合，同样意图建设区域间融合。在此基础上，这一倡议有望实现一种新的融合：区域主义和区域间主义的结合，这是大大不同于诸如欧盟、东盟、西非经济共同体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其它融合项目的。

“一带一路”战略的“中国模式”最别具一格、令人惊叹的部分，首先当属其经济驱动的实用主义，它不局限于某个狭隘的地区，而是一开始就打算包括进不同形式的跨区域间主义以及混合区域间主义。当今世界，最为紧迫的挑战包括财政乱局，国际市场危机，以及资源和环境问题，“全球化”是这些挑战的本质特征；那么至少在此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似乎比起种种区域融合项目，能够更好应对这种本质特征，因为后者皆是在十分不同于现今的历史和国际政治环境下建立的。

此外，民族主义政治和双边互惠主义的崛起，也使中国的提议可被视作一个机会，帮助开始更为多边的全球管控，重回更为宽松自由的管理办法和贸易关系，以避免特惠贸易协定的弊端。

欧盟应该如何应对？

“一带一路”这一宏大倡议常常仅被视作中国获得海外贸易新市场的机会，亦或是中国从地缘政治出发制定的战略。然而，这种观点有所欠缺，它忽视了这一倡议的多面性，没有考虑到这一倡议同样也能给欧盟带来新的前景。因此，欧盟机构和成员国政府应改进现在的态度，更加重视这项倡议。更具体地说，欧盟可将“一带一路”视作双重机会：一方面，欧盟能够借此机会重新积极参与国际关系的塑造；另一方面，欧盟能够借此帮助塑造更加自由、多边的国际贸易体系，抵御高度贸易保护主义的互惠政策，比如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和其他跨大面积区域的此类协定，这些协定明显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原则。

在欧盟近来的危机和当前棘手的美欧关系的背景下，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以求建立更有力的亚欧关系，把握住了好时机。考虑到中国

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欧盟与中国间不局限于贸易方面的交易持续稳步上升，早晚会需要更可持续的计划和机构安排，来辅助高效公平的往来，这一倡议就更可谓适时了。

可为何欧盟竟仍不愿参与进来？当前的局势下，它又应怎样应对呢？欧盟不愿参与，原因之一在于，“一带一路”战略仍处于其初始发展阶段，鲜有细节表明，它将在实践中如何运作。同时，中国政府显然不仅十分渴望复兴古丝绸之路，而且也努力说服新成员加入这一计划，探寻合作的种种可能。既然仍处于计划制定阶段，欧盟可获利于积极参与，塑造其进程，加入自己的想法和立场。欧盟也可以帮助明确重要议题，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基于的具体法律和政治框架。换种说法，如果欧盟想要参与塑造“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路线，那么它就不能想着半路上车，而是应该一开始就参与进来。

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关键，因为我们要意识到，欧盟远不只是一个贸易集团。它同时也是一个由许多机构和欧盟既成法规构成的政治和法律集体，会产生遵从既有标准和常态的需求。

这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确实想开展它的宏大计划，它需要采取整体的考虑以说服仍犹豫不决的欧洲国家，因为欧盟必须保持它多年以来累积形成的立法、法令律例和司法判例，同时也会想要建立一个更为广阔的法律、司法，甚至政治框架。

但如果不这么做呢？那么最多也便是一切照常，也就是说，亚欧之间仅仅是贸易合作，就像现在正行的那样，如此也不需如“一带一路”这般意义深远的倡议了。

如何使“一带一路”倡议发挥作用？

纵使这一项目只有部分如中国设想的那样奏效了，积极效果仍是巨大的，不论是对于中国和世界经济，还是对于复兴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尤其是海上丝路——的基建和政治发展。尤其现在中国经济减速增长，“一带一路”将会为其注入新的活力。然而，考虑到这项倡议的规模和范围，以及众多参与国，其成功实现将依赖于以下四个重要方面：

第一，“一带一路”旨在成为一项多边行为，基于所有参与国家的双方协定，互惠互利。然而，有必要正式确认目标，明确具体协定，以确保这种宗旨能够转化成未来的行动。这也就是说，“一带一路”不仅需要经济和财政基础，更加需要坚实的法律和政治基础。中国如果只是单方面地为自己寻求新的市场，是无法吸引欧盟的加入的，同样也难以吸引其它 65 个可能参与的国家。

第二，“一带一路”可以成为稳定和加深欧盟和中国的贸易关系的绝佳机会，可以作为进一步改革以及深入政治合作的途径。欧盟应该抓住这一机会，和中国平等对话。但是，欧盟是否愿意参与这一倡议，仍很大程

度取决于“一带一路”形式和内容的明确。

第三，具体地说，虽然“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旨在减少贸易壁垒，加强相互投资的多种领域，但是“游戏规则”仍需明确，而且这些规则必须透明，经得起批判性的公开讨论。“一带一路”不应成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或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那样的互惠协定，更不该重复它们的缺点。欧洲对于此类协定的普遍反对意见已经表明，欧洲社会的广大部分不愿接受不透明的贸易制度和低标准，比如在消费和环境保护方面。第四，考虑到其规模，“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大量投资。按照目前的设想，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将会提供部分的财政支持。但这还是不够，确实实现这一倡议需要其他投资方。此外，这也意味着，应基于其实用价值和可持续性，仔细选择将要实施的具体项目，同时，也需落实项目的监管控制，避免由于腐败问题和缺少透明而形成大型项目中的资金流失。

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

“一带一路”被普遍认为是一项公开和谐，包容尊重的由市场驱动的倡议，它旨在与联合国宪章保持一致，并给所有参与国家带来利益。这一倡议的五点首要目标是政策协作，机构互联，贸易畅通，财政融合和民众紧密联系。在这一宏大框架下，它不仅给经济发展，更给“一带一路”参与国家的更深入合作和融合提供了新思路。然而，这一倡议不应仅作为贸易协定发挥作用，它也应避免重复互惠贸易协定的缺陷。“一带一路”倡议有望突破创新，成为第一项综合性跨地区项目，但是它的成功需要中国和欧盟的相互协作。

译者 / 徐琼

《中国观》2017年长期征稿启事

为更好地落实新型智库建设，推动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的相互转化，提供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咨询报告与专家建议，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拟就《中国观》向国内外学者长期征稿。《中国观》以中国当下各领域的热点议题为关注重点，每月月刊以“国际视角 前沿观点 中国智库 建言发展”为主题，选编国外顶尖智库最新中国研究成果，并且收录复旦发展研究院访问学者、国内智库专家对当前中国热点问题的政策分析。

一、征稿要求

1、政策分析或建议，对前瞻性、综合性问题有深度思考，选题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内政、外交、经济、社会、教育等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

2、英文版：可推荐国外智库或主流媒体发表的英文稿件（如为其他种类语言，请附上200字左右文章概述），亦可投送本人英文研究成果，经编辑部确定用稿后，由荐稿单位或个人组织翻译，或由编辑部统一翻译。

3、中文版：（1）各单位或个人可向编辑部投送稿件，选题自拟，语言精练、平实，避免学术化，字数3000字左右，文末附100字以内的作者简介；（2）如稿件涉及重大敏感问题，请勿用电子邮件直接发送，将文稿刻录光盘同纸质文本一并寄送至编辑部。

二、投稿须知

1、投稿邮箱为：thinktank@fudan.edu.cn，投稿时邮件主题处填写稿件标题，在文末附上以下内容（个人信息十分重要，要求准确无误）：文章标题、作者姓名、荐稿人姓名（或单位名称）、邮寄联系方式、电子邮件、电话号码。

2、一次一稿，请勿一次多稿或重复投稿。

3、允许稿件向其他刊物或渠道投送，录用意见一月内给出。一旦录用，编辑部会给予适当奖励。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昊，王柯力

联系电话：021-55665596

电子邮件：thinktank@fudan.edu.cn

寄送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智库楼211室

邮编：200433



复旦发展研究院

复旦发展研究院成立于1993年2月12日，对外立足于一流智库的建设，为国家和上海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复旦的思想与智慧，成为国家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对内立足于学科的交叉与整合，研究团队的建设与发展，以国家需求推动学科整合，以学科整合贡献国家发展，提升复旦大学在国家建设与进步中的地位与影响。复旦发展研究院所孵化和培育的研究机构包括7个国内中心，即：金融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传播与国家治理中心、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3个海外中心，包括：复旦-UC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复旦-墨西哥中心（墨西哥蒙特雷技术大学）；1个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家俱乐部，2个大型论坛秘书处，分别为中国大学智库论坛秘书处与上海论坛组委会秘书处。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

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在上海市教委领导下，依托复旦大学，致力于培育和提升上海高校智库建设的能力和水平，构建国内有地位、国际有影响的上海高校智库体系，以服务出管理、以内部交流出整合、以国际对话出影响、以评估出质量、以贡献出地位，搭建立足上海、服务全国和放眼世界的交流平台、推介平台和国际对话平台。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聚合上海高校的学术和智库资源，转化智库研究成果，为国家和政府建言献策；通过媒体向大众推介智库思想，实现学术成果的社会价值；培育有咨政能力的复合型优秀学者，推动高校学科建设，促进新型特色高校智库发展。

中国的角度

世界的维度

专业的深度

战略的高度

一般性声明：

* 本刊仅供本刊编辑部呈送的特定对象阅读使用，不做任何商业用途。

* 除明确提示的文章外，本刊其他文章基于已公开信息编译或选摘，但本刊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

* 本刊所编译、选摘的文章，仅如实、客观反映原作者观点和立场，并不代表本刊编辑部的观点和立场。

* 本刊属于内部资料，本刊编辑部对其保留一切权利。除非本刊编辑部事先书面授权，本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成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品，或分发给特定阅读对象以外的人。

General Statement:

* This publication is provided by the editorial team for use by specially designated persons only. It is not for sale or redistribution.

* Unless otherwise noted, this publication's content is compil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said materials.

* Views expressed in the articles here are the original authors' own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editorial team.

* Material on these pages is for internal reference only. The editorial team reserves all rights. No portion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copied, altered in any way or transmitted to others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editorial team.